



当 | 代 | 中 | 国 | 社 | 会 | 变 | 迁 | 研 | 究 | 文 | 库

乡村工业化与 村庄共同体的变迁

梁 晨◎著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Rural Community*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当 | 代 | 中 | 国 | 社 | 会 | 变 | 迁 | 研 | 究 | 文 | 库

乡村工业化与 村庄共同体的变迁

梁 晨◎著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Rural Community*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村工业化与村庄共同体的变迁 / 梁晨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4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文库)
ISBN 978 - 7 - 5201 - 4640 - 1

I. ①乡… II. ①梁… III. ①农村 - 工业化 - 关系 -
农业合作组织 - 研究 - 中国 IV. ①F320.1②F32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65114 号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文库 乡村工业化与村庄共同体的变迁

著 者 / 梁 晨

出 版 人 / 谢寿光

责任编辑 / 赵 娜 马云馨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群学出版分社(010)59366453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214 千字

版 次 / 2019年4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4640 - 1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文库编委会

主 任 李培林

副主任 陈光金 张 翼

委 员 （按姓氏音序排列）

陈婴婴 景天魁 李春玲 李银河

罗红光 王春光 王晓毅 王延中

王 颖 杨宜音

总 序

推进中国社会学的新成长

中国社会学正处于快速发展和更新换代的阶段。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上大学的社会学人，已经陆续到了花甲之年。中国空前巨大的社会变迁所赋予社会学研究的使命，迫切需要推动社会学界新一代学人快速成长。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面临拨乱反正。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以紧迫的语气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繁重的任务，思想理论工作者当然不能限于讨论它的一些基本原则……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所以必须急起直追，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力戒空谈，“四个现代化靠空谈是化不出来的”。此后，中国社会学进入了一个通过恢复、重建而走向蓬勃发展和逐步规范、成熟的全新时期。

社会学在其恢复和重建的初期，老一辈社会学家发挥了“传帮带”的作用，并继承了社会学擅长的社会调查的优良传统。费孝通先生是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他带领的课题组，对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农村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发现小城镇的发展对乡村社区的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发表的《小城镇·大问题》和提出的乡镇企业发展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议题，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受到当时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发展小城镇和乡镇企业也随之成为中央的一个“战略性”的“大政策”。社会学研究所第三任

所长陆学艺主持的“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形成了100多卷本调查著作，已建立了60多个县（市）的基础问卷调查资料数据库，现正在组织进行“百村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集体撰写了第一本《中国社会发展报告》，提出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的同时，也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从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社会结构转型时期。在社会学研究所的主持下，从1992年开始出版的《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社会蓝皮书”，至今已出版20本，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并受到有关决策部门的关注和重视。我主持的从2006年开始的全国大规模社会综合状况调查，也已经进行了三次，建立起庞大的社会变迁数据库。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理念，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开始，也意味着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重大机遇。2005年2月21日，我和我的前任景天魁研究员为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做“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讲解后，胡锦涛总书记对我们说：“社会学过去我们重视不够，现在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是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时机，也可以说是社会学的春天吧！你们应当更加深入地进行对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的调查研究，加强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思想的研究。”2008年，一些专家学者给中央领导写信，建议加大对社会学建设发展的扶持力度，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批示：“专家们来信提出的问题，须深入研究。要从人才培养入手，逐步扩大社会学研究队伍，推动社会学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目前，在恢复和重建30多年后，中国社会学已进入了蓬勃发展和日渐成熟的时期。中国社会学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不仅受到国内其他学科的广泛重视，也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现在，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跨学科研究，都有社会学家的参与。中国社会学已基本建立起有自身特色的研究体系。

回顾和反思30多年来走过的研究历程，社会学的研究中还存在不少不利于学术发展的问题。

一是缺乏创新意识，造成低水平重复。现在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不可谓不多，但有一部分“成果”，研究之前缺乏基本的理论准备，不对已有

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不找准自己在学科知识系统中的位置，没有必要的问题意识，也不确定明确的研究假设，缺少必需的方法论证，自认为只要相关的问题缺乏研究就是“开创性的”、“填补空白的”，因此研究的成果既没有学术积累的意义，也没有社会实践和社会政策的意义。造成的结果是，低水平重复的现象比较普遍，这是学术研究的大忌，也是目前很多研究的通病。

二是缺乏长远眼光，研究工作急功近利。由于科研资金总体上短缺，很多人的研究被经费牵着鼻子走。为了评职称，急于求成，原来几年才能完成的研究计划，粗制滥造几个月就可以出“成果”。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有的人产生浮躁情绪，跟潮流、赶时髦，满足于个人上电视、见报纸、打社会知名度。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不顾个人的知识背景和学科训练，不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不愿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也不考虑基本的理论和方法要求，对于课题也是以“圈”到钱为主旨，偏好于短期的见效快的课题，缺乏对中长期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

三是背离学术发展方向，缺乏研究的专家和大家。有些学者没有自己的专门研究方向和专业学术领域，却经常对所有的问题都发表“专家”意见，“研究”跟着媒体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发表的政策意见，往往离现实很远，不具有操作性或参考性；而发表的学术意见，往往连学术的边也没沾上，仅仅是用学术语言重复了一些常识而已。这些都背离了科学研究出成果、出人才的方向，没能产生出一大批专家，更遑论大家了。

这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组织的“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文库”，主要是由社会学研究所研究人员的成果构成，但其主旨是反映、揭示、解释我国快速而巨大的社会变迁，推动社会学研究的创新，特别是推进新一代社会学人的成长。

李培林

2011年10月20日于北京

序言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梁晨的新书《乡村工业化与村庄共同体的变迁》即将付梓，希望我为该书写个序，作为梁晨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时的导师，也作为一个和梁晨一起在华北某省西河村花费了许多时间进行田野工作的老师和同仁，我欣然应允。

西河村是我们团队众多田野调查点中的第一个，屈指算来，对它的调查到今年已经有 23 个年头了。我未退休前，我们基本按照追踪的思路，每年至少去一次，看看村庄的变化，同时也给学生田野实践的机会，接受这种田野的熏陶，访谈已经变成我们朋友的村民，积累村庄变迁的资料。渐渐地，这个村庄真成了我们田野的“富矿”，陆陆续续出过 6 篇硕士学位论文、3 篇博士学位论文（不包括梁晨）。

2010 年我退休之后，总觉得放弃这个调查点很可惜，再说陆陆续续也有些我们社会学系本科的同学希望参与我们的田野调查，梁晨这时虽然已经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工作，但她出于对田野调查的强烈兴趣，主动请战，希望加入去西河村调查的队伍。她与她的先生陈华珊，为了我们这样的调查付出良多——作为定量研究专家的华珊不仅参与我们的调查，还是义务驾驶员，从北京去西河村，一路开车接送，起早贪黑，毫无怨言。那些年参与调查的同学都会记得在车边迎接他们的华珊的微笑。梁晨除了调查，还要兼做行政助理，到目的地后安排食宿调查都是她。到了访谈时，她则义不容辞地担当主访的角色。在回京之后，她总是最先完成田野日记与大家共享。梁晨在书中自述“自 2006 年起到本文中案例的截止时间点 2016 年，我先后 7 次进入西河村调研”，并谦虚地说“（我）先后访谈了包

括村支书、村主任、村会计，以及工厂主、养殖户、打工者等普通农民在内的多个村民”，“对西河村的村庄人物和故事有一定了解”。根据我的体会，这样调查的效果，应该说做到了对西河村的人物与故事均能“烂熟于心”，所以，说本书能如数家珍般地娓娓道来也不为过。

纵观梁晨此书，我觉得有两个特色。其一是她对“村庄共同体”这个概念做出了自己的解读。她认为，“村庄共同体”这个概念有三个意涵——“村庄公共利益、村庄社会秩序和村庄文化规制”，这三者是“村庄共同体得以形成的三条纽带”。正如梁晨所言，“村庄公共利益是村庄团结的基石”。我们在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流出地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田野调查都表明了这一点。有村庄公共利益或者说公共品的提供，这个村庄一定会有凝聚力，公共利益巨大的地方，村民一定对村庄的公共事务有着强烈的关心，参与热情也很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村庄公共利益构成了村庄共同体存在及是否具有活力的测量指标。可惜，这一点被以往的“村庄共同体”研究忽略了。接着，梁晨认为“村庄社会秩序可以从村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中体现，即生活在村庄内的人们所处的位置以及人际关系是维持共同体运行的保障”。村庄社会秩序其实就是一系列的基于当地“社区情理”的社会规范及在其背后的社区意识和价值观念，当然也包括了人们之间相互对待的关系准则。正是人们对这些规范和准则的遵守以及对不遵守者处罚的有效，才保证了“村庄共同体”的正常运行。至于“村庄文化规制”，按梁晨的解释，则“是村庄内人际关系、道德风俗和乡土伦理的总和，包括村庄的人际关系、文化、道德、舆论等方面，其归根结底是人与人、人与村庄的关系”。而这些，无不需要从村庄的日常生活切入，对于人们的日常活动加以社会学的透视，才能认识与把握。这就是“于平淡中见神奇”的功夫，是对研究者的挑战。梁晨要在近二十年的访谈资料中提取这样的内容，无疑是要有理论勇气的。

第二个特色，我认为是这个研究具有强烈的历史感。我一直认为，一个“好的”社会学研究，就应该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因为唯有在历史过程中我们才能对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给出准确的因果解释。在《城乡日常生活：一种社会学分析》一书的前言中，我曾这样写道：“这些年的研究实践使我们越来越认同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这种‘大历史观’在有的文章中被解释为用‘长时间、宽视野、远距离’的宏观角度来重新检

视历史这样一种研究设想^①。我们深切感到，离开这样的设想，就无法认识和把握村落中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和可以看到的种种现象。因为只有在‘长时间、宽视野’中我们才能理解和认识这样的事件和现象所蕴含的普遍意义并在发生学的层面给出一个准确的解释。”但是，我们也感到，“在田野调查中考察某个事件或某种现象时，为了达到精确认识和准确把握，‘近距离’的观察和描述也是必要的。因为从现象学的视角来看，所谓‘细微’的现象之背后一样有着深刻、具体并与现象相连的类似‘本质’的东西。这就是现象自身所浮现的意义”^②。“正是出自这样的想法，我们希望在自己的研究中能做出历史感和层次感，并也试图用这样的想法去影响学生。”

我们看到，梁晨的这本书，从内容上说，涉及西河村自1961年迁村至今的历史。在20世纪80年代，更涉及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对中国农村的影响，这样，该书中人物的活动，无一不被打上社会变迁的印记。至梁晨资料截止的2016年，我们在此地调查的20年中，目睹了作为该村在改革开放中获得红利及经济发展重头戏的村庄草根工业的兴盛和衰落，梁晨写出了这样的变化，也试图揭示这样的变化发生的原因，而在这样的变化的背后则是村庄共同体的兴衰。因此，这样的做法可以帮助我们“小中见大”，认识和把握这些年来来的宏观社会变迁的实质。

在以往于北大的学习生涯中，梁晨的勤奋和聪颖在我们团队中有目共睹。我希望，该书的出版能激励梁晨继续前行，在学术上取得更多的进步和成就。

杨善华

2019年3月

① 杨念群：《黄仁宇的历史与文字世界》，《中国图书商报》2001年8月16日。

② 杨善华、程为敏主编《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生活》（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序言二

看到梁晨的博士论文修改稿，我感到由衷的欣慰，因为她终于能让自己的成果拿来出版了。一位老先生说过，在一生中，一个人能真正认真用心花时间写作的文章和专著并不多，博士论文就是其中之一。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如此对待博士论文，但是，梁晨在博士论文写作和修改上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所以我一直提醒她抓紧将博士论文修改完善，争取早日出版，也对得起自己花的心血，更重要的是她的博士论文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创见，如果不能出版，岂不可惜吗？经历了多年，她终于拿出修改稿，岂不是值得高兴吗？

梁晨的博士论文以一个村庄工业化变迁对村庄共同体的影响为议题，探讨改革开放以来村庄共同体变迁逻辑以及背后的原因，回应当前备受关注的乡村原子化、个体化问题的讨论。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而且有关村庄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林林总总，那么，能否在这么多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有一些研究新意，确实有很大的难度。好在她在北京大学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就开始关注这个议题，历时比较长。在她的硕士生导师杨善华教授的指导和带领下，她与她的同学们一直在对西河村展开全方位的调查研究，据说已经诞生了多篇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先后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了研究论文。为什么这么多人又如此长时间执着地去调查和研究一个村庄？这样做的价值何在呢？会不会出现重复研究的问题呢？梁晨有没有可能有自己的突破和新发现呢？基于以上原因，一开始我对她的选题确实还是有一些顾虑，但是，后来发现我的顾虑是多余的了。实际上，对一个村做长时段的研究，并非没有先例，而且研究发现不菲。比如，费孝通教授曾五

下江村开展调研，每次调研都有新的发现，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判断；林耀华先生的《金翼》研究之后，还有庄孔韶先生所做的《银翅》研究；等等。最近时兴对前辈研究过的村庄进行重新研究的做法。可以说，追踪或长时段跟踪研究，已经成为我国村庄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方法。杨善华教授带领的团队对西河村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过，迄今已有 23 年了，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调研材料，而且研究成果推陈出新，从经济、生活、文化、信仰、政治等不同角度去探索一个村庄的变迁所蕴含的社会学价值，这在村庄研究上是不多见的。梁晨的博士论文既得益于这个团队的长时间研究，也为这个研究做出了贡献。她从 2006 年开始，曾多次跟着团队或者单独进入西河村，展开深入的调研，积累了不少第一手材料，同时还可以借助于其他团队成员的调查资料，因此，为其撰写博士论文，奠定了扎实的调研基础。这从她在论文中讲述的一个个生动故事中得以体现。

当然，一篇有价值的博士论文不应仅仅停留在讲述生动的故事层面，更重要的是从故事中讲出一些有创意的理论观点，甚至提出新的概念或命题。梁晨的博士论文旨在从呈现的故事里挖掘中国乡村共同体的内涵以及变迁机制和影响因素。共同体研究一直是社会学这门学科中经久不衰的显议题之一，但是，不同的社会学者对共同体的理解却千差万别，以至于迄今还没有达成普遍一致的认识。作为共同体研究的鼻祖，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一个面对面交往频密、感情纽带强、长期形成的人群（有一定区域范围）；相对于“社会”而言，按涂尔干的说法，那属于机械团结概念。但是，以研究社区（有人将其翻译为共同体）为重点的芝加哥学派则视共同体为一种社会生态空间，偏重于人们在一定空间中生活的状态，不一定有很强的情感纽带。再后来，帕特南则更多地从社会资本角度去理解共同体等。自从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后，共同体尤其是命运共同体又成了一个热词，但是，这个共同体可能又不同于最早滕尼斯提出的共同体。尽管有不同的定义，但是其中还是有一些共性的含义，比如它是一个群社概念，其成员有着普遍的认同，还有较多的交往关系等。显然共同体在人类较早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共同体得以存在的条件越来越少，这似乎意味着共同体也越来越少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共同体消失了。当然对此，有不少讨论和研究。就中国而言，在过去四十多年的快速现代化进程中，共同体是否受到挑战？

是否被削弱了或者不存在了？共同体的诸如此类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呢？有不少研究确实认为中国乡村社会已经出现原子化、个体化现象，我也曾认为乡村出现了个体化趋势，但是并不意味着共同体已经不存在了。梁晨的研究更深入地揭示了村庄作为共同体并没有消失，但是并不是原封不动的，特别是在过去的四十多年历史中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渗入，村庄共同体发生了波动性变迁。也就是说，村庄共同体在现代化进程中并不是不变的，但也并不是就能消失的。

同样，梁晨的研究表明，共同体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或地区有着不同的含义，也就是说共同体存在多样性，正如社会有着多样性一样。在她研究的一个中国中部的工业化村庄中，村庄共同体体现在村庄公共利益、村庄社会秩序和村庄文化规制三个面向。这三个面向并不是在中国所有村庄都存在，同样，在其他国家也不一定存在。但是，从中国村庄演变来看，这个村庄显示的一些情况又有普遍性：比如中国乡村经历过人民公社和计划经济体制，因此，集体的面向或者说公共利益面向或曾明显地存在过，或现在还依然存在；同时，中国村庄的历史都比较悠久，形成了特定的文化规制；还有，家族观念在许多村庄都是相当明显的。与此同时，在文中我们还感受到了另一个隐藏的面向，那就是国家的影响，即中国乡村共同体中的“国家在场”尤其显眼、突出：村委会、党委（或党支部）以及公共服务等在一定程度上对村庄共同体的形塑是非常关键的。相对而言，欧美国家乃至日韩等乡村，共同体的自主性更为明显，国家的影响就小很多，没有那么大的形塑能力。

梁晨的博士论文研究的价值至少有这么几点：第一，中国村庄共同体并没有在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中退场，而是有了新的内涵和变化；第二，中国村庄共同体既有与其他国家的一些共性，又有一些独特性；第三，影响村庄共同体的因素除了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之外，国家是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在社会秩序的构成和延续中，村庄共同体依然扮演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目前确实存在一些危机：人口的流失、市场的侵蚀、行政的不当干预以及现代文化的渗透等，使得原有的共同体机制出现部分解构的现象，这需要有意识的补救性干预。当然，梁晨在此书中没有对此进行深入地讨论，但是她的研究已经为后续更进一步的探讨，提供了一些有意义的研究发现和视角。

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梁晨不论在研究素材挖掘上还是在文本呈现上，有一个特点就是细腻的深描，特别是对一些细小环节，会给予仔细的关注和挖掘，给人一种“发现新大陆”的惊喜。比如对村庄纪念碑的分析、对家族关系的描写，都体现了这一点。

当然，任何研究都有一些遗憾，这也为以后的研究留下了空间。希望梁晨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后续的研究。首先村庄的变迁还在进行之中，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西河村作为村庄共同体，是否有可能发生新的变化？在这个变化中国家的影响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此同时，比较研究实属必要，单个村庄的研究在知识产出上是有限的，费孝通教授从江村研究转向村庄类型比较研究，已经给出了很好的研究路径和经验，在比较研究基础上能有更重要的理论创新。总而言之，梁晨博士论文的出版，无论是对她个人的学术成长还是对相关领域的研究都是一件值得点赞的好事。

王春光

2019年4月

前 言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乡土工业在广大农村地区蓬勃发展。在乡土工业化的过程中，村庄共同体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本研究以华北某省 P 县西河村为案例，关注类似于涂尔干社会团结的命题：村庄共同体为什么日渐衰败？村庄的公共生活在工业化之后为什么反而发生了衰减？这种衰败与村庄工业化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是否能在村庄工业化过程中形成新型的社会团结？本研究试图从乡村工业化所引发的村庄公共利益、村庄社会秩序以及村庄文化规制的变化入手，探讨乡土工业化发展历程中村庄共同体的变迁路径，并以此为基础讨论村庄建设的基础与可能性。

以往对共同体的研究，或缺乏对中国语境下共同体概念的深刻解析，或用二元对立的方式看待村庄共同体，从而缺乏对村庄共同体变迁的脉络的梳理，尤其缺乏对两种社会形态交织存在时其特征的归纳。其实，中国的村庄共同体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处境，尤其是乡村工业进入农村，深刻影响了农村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和道德风俗，这时村庄共同体介于两种社会形态之间，传统与现代、理性与人性等因素都夹杂在其中，因此需要对其现状和变迁过程进行进一步的解析。

本研究正是从这里出发，通过华北某省 P 县西河村在乡村工业兴衰过程中村庄公共利益的分配、社会秩序的瓦解与村庄文化规制的变化，来试图解释当村庄共同体在面对本土产生的乡村工业时所发生的变迁。本书认为，村庄公共利益、村庄社会秩序和村庄文化规制是村庄共同体得以形成的三条纽带。村庄公共利益是村庄团结的基石，乡村工业化通过影响公共利益，影响着村庄共同体或者村庄团结。但是在现有的共同体理论中，对

公共利益的关注并不多。实际上，在传统社会中，村落公共利益一直是维系村庄合作和团结的基础，由此形成了各种村庄文化，这些村庄文化又进一步界定了村庄公共利益。村庄社会秩序可以从村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中体现，即生活在村庄内的人们所处的位置以及人际关系是维持共同体运行的保障。而村庄文化规制是村庄内人际关系、道德风俗和乡土伦理的总和，包括村庄的人际关系、文化、道德、舆论等方面，其归根结底是人與人、人与村庄的关系。对于本书来说，我们需要讨论村庄文化规制在经历了工业化之后是否发生了变化、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比如村庄之内的亲戚关系、血缘关系依然存在，但其内涵是否与以前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而这些社会关系的内涵和本质的变化恰恰是共同体整合原则变化的根本。

西河村早期的村庄共同体在强烈的集体主义特征中蕴含着家族主义的暗流，最终形成这一时代带有家族意识的集体主义民风，共同集体记忆造就了村庄凝聚力，西河村的村庄工业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这一阶段村庄共同体在经济层面和认同感方面都呈现高度凝聚的特征，村庄精英在“泽被乡邻”的乡土伦理观念下，实践着个人发展与集体主义同在的行为方式。但是在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工厂制度的原则与村庄乡土规则产生冲突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村庄的人际关系；理性化之后的精英不愿为村庄共同体的建设投入金钱和精力，减少了公共品的提供；村民对村庄的认同和自豪感付诸东流，不愿参与到村庄治理中，对政治漠不关心。西河村的公共资源、文化认同和社会秩序三个方面都变得松散，上一阶段村庄内的高度凝聚力不复存在。在乡村工业衰败之后，经过工业化洗礼，对村庄精英失望透顶的村民对村庄的期待只剩下渴望得到更多的福利，村民变得理性化，村庄共同体的团结机制也从道义型向功利型转变，共同体进一步离散化。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第二章 工业规模化之前的道义共同体（1961 ~ 1977 年）	25
第一节 干部口碑与集体认同	25
第二节 明为集体暗为家族的“新家族主义”	37
第三节 立碑	45
第四节 建村之初道义共同体的建立	48
第三章 泽被乡邻：工业化初期的能人治理与高度凝聚的村庄共同体（1978 ~ 1992 年）	50
第一节 受益于原有社会关系的乡村工业起步	50
第二节 不怕撤职，聂范良为大伙广开生路	52
第三节 以才取人，超越家族的队办企业	59
第四节 增加福利，帮带全村农户走致富之路	72
第五节 快速发展的乡村工业与高度凝聚的村庄共同体	77
第四章 市场化与乡土情理的拉锯（1993 ~ 2009 年）	81
第一节 市场导向与企业家的理性化	82
第二节 村庄政治生活凋敝与减少村庄公共品提供	102
第三节 有限的个体化	120
第四节 市场化过程中村庄共同体全方位的转变	132